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
武汉市博物馆
编

TUSHUO

Wuhan Chengshi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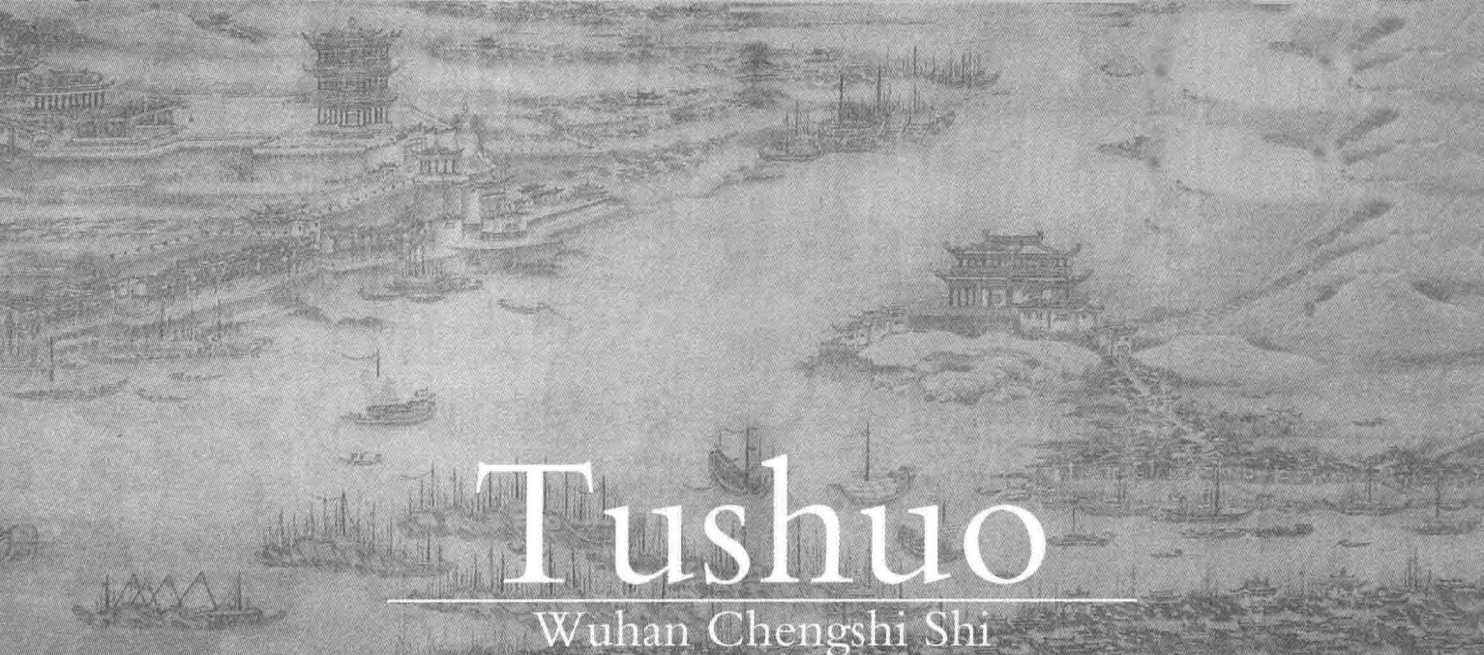
图说武汉城市史

□ 涂文学 刘庆平 / 主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Tushuo

Wuhan Chengshi Shi

图说武汉城市史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
武汉市博物馆
编

主 编

涂文学 刘庆平

副主编

李卫东 朱 莉

作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庆平 朱 莉 李卫东 宋晓丹 汤 蕾 周德钧 姚伟钧
胡俊修 涂文学 夏建建 彭 建 彭建新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武汉城市史/涂文学,刘庆平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430-4683-2

I. ①图… II. ①涂…②刘… III. ①城市史—武汉市—通俗读物 IV. ①K296.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9773 号

主 编:涂文学 刘庆平

责任编辑:孙 敏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路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16

印 张:33.125 字 数:1200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 Contents

1	导论 武汉——城市形成的机理与性格	
	从“双城”到“三镇”：城市格局中的“城”、“市”关系	2
	“商”、“兵”互动：战争与商业对武汉城市品格的影响	7
	天时、地利、人和：武汉近代崛起的奥秘	13
	“势”之使然：武汉城市盛衰的解读	21
31	第一章 沧海桑田——武汉城市发展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	
	地质与地貌	32
	生态与资源	34
39	第二章 文明之源——史前时代的武汉	
	文明源起 曙光初现	40
	一脉相承 融合发展	41
	人文初祖 精神永传	46
51	第三章 城市之根——上古时期武汉地区的城市文明	
	盘龙肇始 城邑渊藪	52
	“汉阳诸姬” 封邦建国	56
	凤舞天骄 荆楚流风	61
71	第四章 因武而昌——军港城堡的营建与武阳双城的兴筑	
	东汉三国时期的城堡与军港	72
	南朝时期武汉地区的战事	76
	汉魏六朝时期夏口城市经济的初步发展	79
	楚文化的流变与佛道文化的传播	84
	木兰文化	89



目录 | Contents

93	第五章 “双城”并峙——隋唐两宋时期的武汉
	鄂州、汉阳双城并峙 94
	岳飞跃节鄂州 95
	“东南巨镇” 98
	“贸迁之会” 99
	鄂州城市手工业的全面发展 101
	隋唐时期的考古遗址 103
	佛道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105
	黄鹤楼：文化名楼的形成 106
109	第六章 通都大邑——元明时期武汉的崛起
	湖广行省 110
	“天完”、“大汉”与“大西” 111
	元代武昌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13
	湖广会城武昌 114
123	第七章 三镇鼎立——清代武汉的城市发展
	“汉水改道”与汉口成镇 124
	汉口的堤防与城区 125
	“九省通衢”、“天下四聚” 128
	省城风貌 134
	府城汉阳 136
139	第八章 开埠通商——武汉城市的现代转型
	在近代的门坎前：开埠前的武汉社会 140
	开埠：在被动与主动之间 145
	开埠以后武汉社会的变迁 149



163	第九章 自强新政——张之洞洋务活动和武汉的崛起
	江汉起宏图：武汉洋务运动及其成就 164
	外圆内方：武汉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174
	东方芝加哥：城市影响和地位的上升 178
183	第十章 首义之城——资产阶级革命的孕育与武昌首义
	风雨前夜 184
	武昌首义 194
211	第十一章 华中重镇——民初武汉城市的曲折发展
	民国初期纷乱的武汉政局 212
	汉口的恢复与重建 217
	武汉新一轮工业建设 222
229	第十二章 赤都武汉——“在大革命洪流中”
	“五四”风涛与“二七”风暴 230
	国民革命军北伐与武汉国民政府 239
	从工农运动到武装斗争 248
255	第十三章 武汉建市——三镇合一与近代市政制度的发展
	城市发展与武汉建市 256
	民国中期武汉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 258
	1931年的水灾与三镇堤防的修缮 266
271	第十四章 保卫大武汉——武汉抗战及城市的陷落



目 录 | Contents

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272

“到武汉去”：抗战文艺风起云涌 277

复兴基石：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280

鹰击长空：激烈的武汉大空战 283

武汉会战：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287

293

第十五章 沦陷岁月——伪殖民统治与城市的衰败

日军暴行与日伪殖民统治的确立 294

铁蹄下的城市变态 305

民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军投降 311

315

第十六章 “光复”与解放——城市的乱局与新生

乱象丛生：接收演绎成“劫收” 316

末日之景：城市经济的崩溃 318

港口的沦落：“东方芝加哥”地位的丧失 321

内战的触发：《汉口协议》的签订 322

民运的高涨：党领导下的“第二战线” 323

迎来新生：“划江而治”的破产和武汉解放 330

335

第十七章 特大城市——“一五”计划的实施与武汉经济中心地位的强化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336

“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华中重工业中心地位的确立 347

361

第十八章 艰难岁月——从整风反右到拨乱反正

整风反右与“大跃进”运动 362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汉 371

385

第十九章 再起鸿图——改革开放与武汉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春回大地：开放与城市综合改革 386

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393



市政建设与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 407

423

第二十章 城市之脉——武汉的历史建筑与街区

长江汉水城之魂 424
 老街曲巷古韵浓 428
 会馆庙观自沧桑 434
 前世今生江汉路 437

441

第二十一章 市井武汉——武汉的市民文化与社会生活

都市民俗 442
 市井百态 453
 社会生活日新月异 459
 饮食文化与汉味名吃 467

475

第二十二章 楚风汉韵——武汉城市文化漫谈

“九省通衢”、“转输贸易”、“五方杂处”——武汉城市文化的“人文生态” 476
 趋新尚变、兼收并蓄、崇实尚利——武汉城市文化的精神特质 478

495

第二十三章 汉上商魂——武汉历史上的名店、名厂

金字招牌“叶开泰” 498
 布衣风范“谦祥益” 500
 鄂菜名馆“老大兴” 503
 小吃大做“四季美” 506
 百年风雨“显真楼” 508
 名重汉上“汪玉霞” 510
 历久弥新“马应龙” 514
 风华绝代“长生堂” 516
 内方外圆“周恒顺” 519

523

后记

导论 武汉—— 城市形成的机理与性格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最伟大的杰作，它不仅表达了人类创造性的欲望，更体现了人类深远而持久的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是一本书，通过对它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文化、宗教、技术和商业演进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生活于斯的人们的理想和抱负。

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千百年来，一代代文人骚客在此竞相吟咏，一群群英雄壮士在此慷慨悲歌。武汉，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城市。“江汉汇通、楚风汉韵、兼容并包”的城市特色，曾使它在众多城市中显得那么卓尔不群；“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又引来那么多艳羡目光。

武汉，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城市。历史上的它曾如此辉煌，却又在当代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迷失自己，以至于武汉人民要发出“武汉在哪里”的问询。而正当武汉市民为武汉“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历史际遇而尴尬时，世界知名的未来学者却预言它将成为世界超级城市。在新世纪“中部崛起”的号角中它又成为引领和探索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城市，它总是给人们带来一连串的问题和思考。

武汉为什么会出现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如何解释这种城市格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武汉在历史上为什么总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战火弥漫的同时又扮演着商业中心的角色？

战争和商业如何影响武汉人的性格？

武汉在近代傲然崛起，其奥秘何在？

武汉曾有过历史的辉煌，后来为什么失落？究竟是地理环境和交通格局的变迁，还是国家政策使然？

.....

为更好地解释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武汉这座城市形成的机理或过程，理解和剖析这座城市。





从“双城”到“三镇”：城市格局中的“城”、“市”关系

1954年，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武汉，抗洪军民在城郊取土固堤，无意中挖出一座商代城池遗址，它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盘龙城。盘龙城的发现把武汉城市的历史一下子推到3500年前，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武汉历史的悠久和厚重。

在中国古代，“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城”，究其原意，本是指盛民、自守。《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说文》亦云：“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从这些解释来看，“城”最初的含义主要是指自卫和自保的军事城堡。其功能主要属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我们在探索武汉城市起源问题时发现，武汉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是以一个“城”的面貌出现，盘龙城就是这样一个“城”。

盘龙城是一个商代城池的遗址，是商代在南方的青铜文化中心。对于这座城池的性质，尽管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最后定论，不过多数观点均认为它是商王朝南征时建立的军事据点，其目的是为了震慑南方蛮族，并取得附近铜绿山丰富的铜矿。

不知什么原因，盘龙城后来在历史上神秘地消失了，直到东汉以后武汉地区才有新的城池出现。东汉末年，戴监军于龟山西北隅筑郢月城（又称偃月城，后为鲁山城），揭开了武汉城市发展的新篇章。郢月城修建以后，公元223年，孙权在武昌蛇山构筑夏口城，作为一座标准的军事城堡，其规模远胜郢月城。为巩固夏口的防御地位，孙权后来又遣大将陆逊渡江夺取鲁山城，并在原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葺扩建，使鲁山、夏口隔江相望，互为犄角。

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夏口城、郢月城，规模都都很有限，充其量只能算是城堡。然而它们的出现却在武汉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武汉“双城”格局的奠基，也意味着武



盘龙城遗址

汉这一地区性政治、军事中心的形成。虽然此后城池几经更名，但“双城”格局在武汉维持了很长时间。

唐初，在汉阳鲁山城的故址上，一座新的汉阳城开始兴建。唐朝中期，牛僧孺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到任后，他在三国时期夏口城和刘宋时期鄂州城的基础上对鄂州城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翻修，以砖结构城垣代替夯土结构的城垣。汉阳古城的营建和鄂州城的翻修，使武汉城市的“双城”格局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元朝建立后，设湖广行省，鄂州更名为武昌。武昌城成为湖广行省的省会，汉阳亦升格为府城，武汉的城市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自此至明清，武昌、汉阳作为长江流域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

与“城”的军事与政治功能相比，“市”则更偏重于经济范畴。古史传说中有“祝融作市”的记载。《说文》也云：“市者，买卖之所也。”《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孟子·公孙丑下》亦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这说明早期的“市”是聚集货物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

早在武汉双城格局初现之际，城市的经济功能便显现出来。当时的沙羡屯、鹦鹉洲、黄军浦、南浦等错落于大江南北，成为运输粮草、物资的重要场所。至隋唐时期，武汉已经成为长江流域中与扬州、益州、江陵等著名港口齐名的的重要商港。大诗人李白当时多次行过鄂州，对鄂州的繁华景象印象深刻，写下了“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的诗句。而正是在此时武汉开始具有“市”这样的称呼。在鄂州城外，兴起了著名的“灵泉古市”。“灵泉古市”位于今天江

夏灵泉山，其地又称覃庙，古来水网密布，四通八达，彼时已形成规模可观的商业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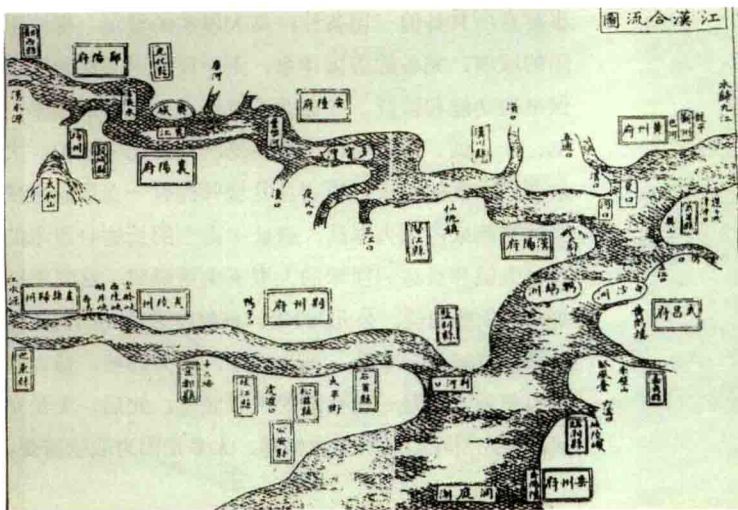
至宋代，随着长江航运的发展和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武汉地区商业获得迅猛的发展，其标志就是“南市”的空前繁荣。

“南市”又称为“南浦”，位于鄂州西南江面与沿岸之间，即鹦鹉洲与鄂州江岸之间的狭长带状水域，形如一条内河，并延伸到巡司河河口一带，江面港湾与江岸街市连为一体。它既是商船停泊之所，又是商品交易之地。陆游在《入蜀记》中记载了“南市”的繁华，他说：“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今杭州）、建康（今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由于火灾，南市后来被焚毁了。不过在南市附近，北倚黄鹤矶的沿江港埠一带很快形成新的市场。“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街市繁华，店铺酒肆绵延数里，往来客商络绎不绝。也就是说，“市”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称呼，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和载体。

在灵泉古市与南市之后，作为“市”存在的商品交易场所和街区一直在武汉存在和发展着，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市”当然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汉口了。明中叶以前，今天的汉口还是一片与汉阳相连的河滩。每到洪水季节一片汪洋，水退之后芦荻丛生，颇为荒凉。明成化年间，汉水下游连年大水，使汉水下游的水文形势发生重大改变，汉水流至汉阳县西排沙口、郭茨口间集中水流，径直东下，经龟山北麓注入长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主河道入江口。“汉水改道”结束了汉水下游河道游移不定的历史，新水口两岸地盘开阔，港湾水域条件良好，再辅以坚固的堤防，很快便成为“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

汉口的兴起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市”的形成过程。最初作为天然良港，船舶停留在此，“舟中为市”。此后，伴随码头的建设，汉口出现最初的街区，从西到东，陆续出现大礮口、小礮口、杨家河、老水



《湖广通志图》中的《江汉合流图》（1732年）

巷、兴茂巷、大王庙、宗三庙、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关圣祠、鸡窝巷、鲍家巷、新码头、流通巷、接驾嘴、龙王庙等。《汉口竹枝词》上说：“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增加，乾隆时期，汉口人口创下10万的历史记录。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汉口人口已达13万之众。从明嘉靖年间到清嘉庆年间，200余年的时间里，汉口镇人口数增加了17倍，这种异乎寻常的人口增长，显然是人口的大量迁入所致。汉口成镇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商业异常繁荣，这里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魅力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投资兴业、置产安家。

汉口的兴起使武汉城市格局从“双城”转为“三镇”。在三镇之中，武昌和汉阳都是“城”，汉口则为“市”。三个风格与功能迥然不同的区域隔江相望，共同组成一个大城市，从此“武汉三镇”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这种独特的城市格局也成为武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武汉城市发展中的“城”、“市”格局来看，武汉城市发展的最初主动力和主脉以“城”为中心，即城市发展的目的是作为地区性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存在。在武汉早期的城市发展阶段，盘龙城、御月城、鲁山城等都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军事堡垒。以盘龙城为例，作为商代在南方的统治中心，它具有军



事要塞所具备的一切条件：高大厚实的城垣、深沟阻隔的城壕、完备的防御体系，无不反映出其作为军事保垒的功能和特征。在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戈、矛、钺、镞、刀、斧等兵器所占的比例最大。大量青铜武器的出土，说明盘龙城曾拥有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强大军队。遗址中出土的长达41厘米的青铜大钺和长达94厘米的大型玉戈更说明了这支军队统帅的权威地位。公元223年，孙权在武昌蛇山构筑夏口城，该城依山负险，城为战守，楼为烽堠，皆以军事为首务，也是一座标准的军事城堡。此后，无论是武昌城还是汉阳城的多次修建，大多是因为战争需要。

从世界城市起源来看，很多著名城市本来起源于战争。城市有利于统治者集中人力资源，并利用城中聚集的大量资源从事武器的制造，如盘龙城对青铜的控制正是因为青铜是当时制作武器的最重要原料。此外，无论是南北朝时期的夏口，还是元明之际的武昌，其地位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成为造船中心，也是源自对战船的需要。对此，著名城市学者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中说：炫耀武力是王权制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城市则以其坚固的城墙、壁垒、壕堑，成了空前恐怖的侵略势力的突出表现，它把猜疑、复仇情绪和国王文告中的不合作态度高度集中起来……作为堡垒存在的城市，长期支撑着统治集团的敌意、封闭和逞强心理，这些又有利于新的战争的继续。”（[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4—35页）

正是因为战争防御的需要，我们看到，无论是武昌城还是汉阳城都依山建设，控制水口，战争的功能决定了武昌和汉阳城池的基本格局，即依山傍水，一切以攻守为要务。同样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我们发现，从建城的角度看，越是在社会政治不稳定、各种军事力量对峙之际，武昌和汉阳的城市建设越受到关注，越能得到发展。

战时，“城”主要作为军事堡垒存在，战事结束后，“城”的主要功能则演变为地区政治与文化的中

心。芒福德说：“城墙的作用无非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军事设施，另一个就是对城里的居民进行有效的统辖。”（[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1页）政治与文化的功能也是古代“城”存在的目的与根源。对于城市起源，西方城市学者认为，世界城市的产生都与宗教有关。这一理论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也有体现，不过表现形式与西方不同，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像西方城市一样形成大规模的宗教场所，而是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心，统治者通过儒家思想对臣民进行教化。孟子说：“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在深厚的城墙内，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王权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农村辐射，对周边区域的广大农村进行统治与教化。教化的内容既包括对皇权的膜拜，也包括对儒家伦理价值的传播与维护。历史上武昌城和汉阳城的城市功能都体现了这一点。长期以来汉阳是汉阳府的府城，武昌更是湖广省的中心。在这两座“城”里，既有气势威严的衙署，也有书声琅琅的学宫。对于“城”的功能，最具象征意义的要属设在武昌城内的贡院，它既是士子十年寒窗、一朝题名的出头之地，也是统治集团选拔青年才俊充实官僚阶层的考选之所。正统的学人文化观念在这里集中展示，站在高大的城墙上俯视广大农村的官员也从这里走出。可以说城墙既是物质的防御堡垒，更是专制时代的精神世界。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虽然城堡在扩大文化影响和聚集政治权力方面功能很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城堡所发挥的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在武汉，尽管“城”是其城市发展的主脉，但“市”的兴起与发展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从城市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市”在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从城市形态来看，如果说是战争、政治与文化奠定了武汉的“双城”格局，那么最终形成武汉“三镇鼎立”的则主要是商业的力量。

在西方，“市”往往是城市的起源，然而在中国，城市起源过程中“城”与“市”并不总是结合起来的，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更多的是政治与军事中心的建立和扩张的结果。中国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即是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这一城市发展特征在武汉城市发展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与军事、政治及文化功能相比，武汉城市商业功能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武汉早期建城并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也不具备贸易中心的性质，其功能主要是区域政治与军事的工具。所以在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在前，“市”在后。而且武汉城市的商业功能在发展初期就表现出独立于城市其他功能而发展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城”、“市”分离的特点。

纵观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尽管在武昌和汉阳城内历代都有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但大规模的商业交易场所往往在高耸的城墙以外，在水路交通便利之处。无论是早期的灵泉古市、南市，还是后来的汉口市，以及那些没有被称为“市”的交易场所，如古鹦鹉洲等，都具有自发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其发展不是有计划的规划与建设，而是商业发展推动的结果。比如汉口，作为明清以来因商业因素而成为“市”的典型，其城市功能一开始就具有非政治化倾向。汉口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地方行政中心，而只是一个附属于省、府和县的地方政权的商业性市镇，早期汉口城区布局完全是自然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生态产物。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他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文化（1796—1889年）》一书中说：汉口城市鲜见政治功能色彩，“没有从政府那儿获得认可和照凭”，不仅政府极少甚至根本不干预汉口的市政事务，而且“市政高级官员也很少真正地干预该城的事务”（汪熙：《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6-27页）。基于非政治化功能的架构有利于商业功能的有效发挥，也成就了一代商业名镇汉口。

尽管商业功能的发展是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

插柳之作，但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1177年南宋文人、政治家范成大行经鄂州城外，看到南市“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其繁盛的景象“外郡未见其比”。范成大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指出，鄂州是“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川、广、荆、襄、淮、浙是南宋王朝有效控制的核心区域。可以说，鄂州此时已经成为南宋王朝的市场中心，其影响不容小觑。至清初，由于商业的发展，汉口已是一个“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商典库藏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的名镇。《大清一统志》记汉口“往来要道，居民填溢，为楚中第一繁盛处”。著名学者刘献庭在《广阳杂记》中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所谓“天下四聚”就是当时中国的四个商业中心，汉口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中西部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这种商业中心的地位，既是对历史上武汉固有的航运枢纽地位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对武汉城市经济功能的进一步提升。

至近代，由于汉口开埠以及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武汉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芝加哥”，进出口贸易居国内各商埠的前列。近代商业的发展使得汉口城市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化，城市发展由“临河型”向“滨江型”转变。在汉口各国租界的示范作用下，一个个新的街区逐步建立起来，汉口在三镇中的地位





影响也迅速提升，并成为武汉城市格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商业的迅猛发展在使汉口的地位日益突出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武汉传统的“城”、“市”关系。“城”的功能和地位开始下降，而“市”却在蓬勃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近代开始的城墙拆除运动。

在三镇中作为“城”的历史，汉口是最晚的（晚清为防捻军而修建），但其城墙的拆除却是最早的。早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就开始有计划地拆除汉口城墙。城墙拆除后，大部分砖瓦成为修筑后湖长堤（张公堤）的材料，在原来墙基的基础上修筑了汉口历史上第一条干道，以利市内交通。1927年武昌开始拆城，除了大东门、起义门、汉阳门等令人寻思的地名外，在历史长河中坚守了近1700年的武昌古城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1928年，武汉三镇的最后一座城墙——汉阳城墙开始拆除。

站在现在的立场看，近代武汉的拆除城墙运动多少有些让人遗憾，因为城墙的拆除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武汉历史文脉的延续，破坏了三镇的历史格局与景观。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近代武汉的拆城运动则是历史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拆城运动”视为一个历史的象征。“拆城”这个行动意味着武汉整个城市功能的一个大改变。汉口城墙拆除后，伴随着后湖长堤的建成，市区面积急剧扩张。在以前城墙的两侧，一片片新的街区陆续建立起来，一片朝气蓬勃的模样。城墙拆除后，武昌、汉阳以前作为一个“城”的功能弱化，开始具备更多的“市”的功能。早期“城”、“市”对峙的城市格局，开始向复合型的综合性“城市”转变。

在考察武汉“城”、“市”格局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武汉城市发展体现出一种“城”、“市”分离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城”和“市”是没有联系的。

首先，从城市起源看，无论是作为“城”，还是作为“市”，武汉的兴起与发展都与便利的水陆交通有着紧密的联系。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汇聚线，城市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组织机构，也首先出现在一些大河流域周围，历史上的人类早期城市多出现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大江大河旁。武汉地处长江中游、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水路交通便利，在军事上西接荆襄、东连吴会、南引沅湘，具有控北引南、承东接西的战略价值，并因此成为兵家争夺的要点。当天下扰攘、群雄纷争之时，这里便成为各种势力争相觊觎的地方。当天下安定，这里又成为统治者对长江中游广大区域实现控制的理想场所。同样是基于交通便利的原因，大量的物资在这里聚集，武汉也因此成为商业繁盛之处。武汉在早期虽主要以城堡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武汉地处江、汉交汇之处，其在军事上的意义重在扼守长江天险、控制江汉水上交通，因此城池的修筑往往临水进行，城市形态具有明显的港城一体的特征。港埠码头的建设使武汉的江河航运十分发达，武汉也自然成为长江流域商业贸易的重要枢纽港口。同时武汉也一直是南方驿道的中心，陆路交通同样便利。在古代，除了战争以外，交通就是城市最主要的动态因素。（[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5页）由于具有大规模的水路运输和便利的陆路交通，武汉在长江流域地区间实现互通有无，平均所有剩余物资，交流不同地区特有的物资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这种商品与物资的交流往往依托港口进行，因这种交流导致的商品贸易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城市体制，在港口附近也就逐渐形成“市”了。

其次，从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看，如果说是战争奠定了武汉的“双城”格局，那么最终形成武汉“三镇鼎立”的则主要是商业的力量。与西方城市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在农业社会的总体背景下，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引盐、漕粮贸易外，政府根本无意于商业的整合和发展。武汉早期城市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武汉地区商业的发展并非是人推动而成，而是附加在城市的政治与军事功能之外，所以早期的城市设计并不包括发展商业的考虑。不过这种附加的商业功能反过来却促使城市形态与格局发生变化，具体到武汉而言就是



“市”的产生。“市”依附于“城”产生，并发展为与“城”一样的规模与影响，这是武汉与中国其他内陆城市的发展过程相比，既相似又有其独特性的一个方面。从早期南市的产生，到后来汉口的崛起，从早期“双城”对峙，到后来“三镇鼎立”，都体现了商业对武汉城市发展的影响。

再次，“城”与“市”在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互补和互动的关系。芒福德说：“市场本身是城市生活安定性及规律性的产物。”（[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5页）正是因为“城”的强大，给“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市”才不再需要高大的城墙等防卫措施，商品交换才可以平稳有序地进行。而商业所带来的不同地区的各种物资满足和支持了城市的消费。同时由于市场的扩张，城市范围逐渐扩大，并突破旧有的“城”的格局，使得城市持续发展。另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城”、“市”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可相互转换。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和捻军在武汉一带活动频繁，为固守汉镇，由汉阳知府钟谦钧等发起，在长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上起硃口，下至沙包（今一元路），全长11华里。堡基由密布的木桩夯筑，整个堡堤由红石层叠累砌而成，汉口开始具有“城”的特征。随着局势的稳定，城堡又被逐渐拆除，成为新的街巷和街区。

“神圣、安全、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毁损其基础，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美]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页）“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有机结合的范畴，不能仅仅理解为“城”和“市”的简单结合。只有当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感觉得到的客观实体，防御功能的“城”与商品交换的“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一词。一个城市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也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商

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衰落，甚至淡出历史的舞台。武汉自上古时期发展至今，能做到长期持续地成长，就在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具备这些要素。武汉的“城”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语言中形成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词，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们也发现，促进武汉城市发展的这些要素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武汉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城域表现突出的城市发展要素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一视角，我们便可以理解在历史上武汉三镇长期分立的基本原因。武汉三镇长期鼎立除了自然地理、交通等因素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城市各种功能的单一性，各城域由于行政区划、城市功能不同等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合。进入近代以后，伴随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革新，城市功能复合化，这正是此后三镇合一的根本动力。

“商”、“兵”互动：战争与商业对武汉城市品格的影响

很多人在儿时见过一个画谜，谜面是一个执戈的古代勇士，猜一座城市的名称。聪明的孩子往往脱口而出：“这是武汉，一个拿武器的汉子。”谜语的设计者本就是就着字面的意思，加上谜语的机巧设计出这个画谜，并无深意，却在无意中让不谙事的孩子形成了武汉是一个爱打仗的勇猛男子的形象，让他们在朦胧中触摸到了武汉城市发展中最根本的一些东西，这的确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武汉是一座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它由军事斗争催生，并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步成长，它的发展总是与大大小小的各式战争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因武而昌”的。

武汉的发展似乎总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换一个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也总是与武汉有关。



如果说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那么，盘龙城显而易见的军事功能就明白昭示出，武汉城市之兴缘于军事与战争。

在盘龙城神秘地消失了千余年后，东汉末年，天下扰攘、群雄纷争，武汉地居长江中游，上扼荆楚、下控吴越，引得各路诸侯在此角逐，争霸称雄，于是乎一幕幕刀光剑影的战争活剧在这里上演，一段段诡秘奇妙的军事史话在此流传。

两晋南北朝之际，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武汉更是战争多发区。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武昌夏口之战，为晋人伐吴决胜之局，在西晋统一国家的大业中，武汉发挥了一战定乾坤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西晋永嘉年间流民起义，东晋永昌时期王敦之乱等一系列战争，使武汉饱受战乱之苦，正如研究者所言：“自汉末三国以下分裂为主的局面，至隋灭陈而变归统一，与这一时代特征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夏口（今武昌）、鲁山（今汉阳）、武昌（今鄂州）饱受战火之苦，在战争中显现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且时兴时衰皆因战争的需要，给武汉城市发展史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刘玉堂主编：《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唐朝末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反唐起义爆发，其中王仙芝所帅起义军转战于江汉地区，攻克蕲州和鄂州（今武昌）。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王仙芝在黄梅遇害后，黄巢领导义军继续起义大业，于次年攻破鄂州外城。唐末农民起义军两战鄂州城（武昌），足见武汉在起义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

至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战氛紧张，武汉又一次成为南北交争的战略要点。因抗金需要，一代名将岳飞曾以镇宁崇信军节度使、荆襄潭州制置使身份坐镇鄂州，拱卫南宋京师临安，北御金兵南犯。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诬陷至死后，鄂州军士曾赋诗哀悼：“自古忠臣帝王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武汉地区留下许多关于岳

飞的遗迹，如武昌的岳飞亭、岳庙、岳松、岳柏和至宝碑，汉阳的翠微峰、翠微池、翠微泉、报国庵和冰塘角、马沧湖等。

元末之际，群雄并起，红巾军起义爆发不久，红巾军就把战争的矛头对准了武汉。1352年，徐寿辉部先后攻克武昌、汉阳。经过反复争夺后，1356年，天完红巾军决定正式定都汉阳。此后，陈友谅又改天完为大汉，定都武昌。反元战争取得胜利后，反元的革命战争演变成各反元武装之间为争夺全国政权而进行的战争，在随后的4年里，陈友谅与朱元璋这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展开了激烈的较量。鄱阳湖战役中，朱元璋的军队击败了大汉军，陈友谅兵败身死，其子陈理在大汉将士的辅佐下继续以武昌为据点与朱元璋对抗。1364年初，朱元璋率大军亲征陈理，占领湖广政治中心武昌，剪除了大汉政权，为其统一全国、“恢复中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末期，武汉再次成为农民起义军革命的中心。在声势浩大的明末农民起义中，武汉地区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交锋，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在这里策马扬鞭，指挥战斗。公元1643年4月16日，张献忠攻占汉阳、汉口后，5月，拿下武昌城。随后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天完”、“大汉”和“大西”三个农民政权存在的时间虽短，却给武汉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晚清之际，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在这场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中，武汉再次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太平军曾三克武昌，武汉城池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多次易主。是否控制武汉成为敌我力量消长的信标。

如果说太平天国依然属于旧时代农民战争的话，那么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武昌首义与阳夏战争在武汉城市发展史上则绝对具有划时代的革新意味。武昌起义的成功不啻一声惊雷，震撼了中华大地。武昌首义，不仅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给武汉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增添了新的荣光。武昌首义后，武汉一度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城市影响力空前上

升，首义志士“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从此成为这座城市精神的内核。

大革命时期，北伐的战火燃到武汉。经过激烈的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攻坚战，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随即决定迁都武汉。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划汉口、武昌、汉阳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1927年4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成立三镇合一的武汉市政府，确定武汉为中央直辖特别市，市政由中央接管办理，由中央党部、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汉口市党部及群众团体推出11人，组成武汉市政机关。从此以后，武汉这座城市有了一个与自己身份相称的行政建制——市，而且三镇第一次在行政建制上统一起来了，虽然后来又几度分合，但三镇合一已成为这座城市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战争初期敌人的疯狂进攻，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主要政府机关则先迁入武汉。一时间，武汉云集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迅速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苏、英、美、法、比、瑞典等国的驻华使节也相继赴汉。武汉，这座华中重镇，再一次焕发了革命青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为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汉期间，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武汉会战。这次会战迫使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武汉会战期间各大机关、学校、技术人才以及大批工厂和大量战略物资内迁到大后方，创造了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奇迹，大大充实了后方抗战的经济实力，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保留了物质和人才的种子。

纵观武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引来历史上各方势力的觊觎和争斗。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几乎都与武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从这个意思上讲，武汉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战争史。

战争是武汉兴起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原因。我国历史上曾有很多因战争而兴盛的城市，如秦朝的虎牢关、唐代的高昌和龟兹、明清时期的蓟州等，后来随着政治与军事格局的变化，均先后衰落甚至消失，所以单纯的军事性质的城市很难持续发展。

从武汉城市发展的整个历程来看，如果说它的兴起和城市形态基本格局的形成是因应了军事斗争的需要、际会了战争的风云，那么武汉的成长壮大，特别是武汉在历史上的几次勃兴则主要是商业发展使然。

早在东汉之际，蔡邕在《汉津赋》中说，武汉“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是“导财运货，贸迁有无”的地方。这种商业上的优势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

自东晋开始，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武汉作为连接中国西北政治中心与东南经济区的枢纽，作用开始凸显，商业港埠的特色开始凸显，至隋唐，武汉已经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商业贸易的枢纽，与扬州、益州、江陵等著名港口齐名。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与商业贸易，鄂州与汉阳的港埠功能迅速从军事转为商贸。“万舸此中来，连帆下扬州。”武汉沿江码头林立，江面上舳舻相连，沿岸街市喧闹，商贾云集，一派繁盛。两宋时，鄂州江渚的南市发展成“沿江数万家，廛闹甚盛”的商贸之区，成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

武汉商业的发展在明清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武汉由双城并峙演为三镇鼎立，汉口因得江汉交汇之便、擅通江达海之利从三镇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天下四聚”的商业巨镇。随着汉口镇的崛起，武汉的商业地位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镇中最晚出现的汉口成为一颗最耀眼的商业明星，并从此引领着武汉三镇在全国的市场海洋中劈波斩浪、奋勇前行。

明清时期，汉口与京、苏、佛山并称“天下四聚”，那时“云、贵、川、湘、桂、陕、豫、赣之货